

# 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变迁

復旦大學 出版社

# 目 录

|            |         |
|------------|---------|
| 创刊词 .....  | 1       |
| 创刊贺词 ..... | 汪敬虞 / 1 |

## 【特 稿】

|                          |   |
|--------------------------|---|
| 洪葭管 试论现实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 | 1 |
| 叶世昌 关于《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   | 7 |

## 【专题研究】

|                                                        |     |
|--------------------------------------------------------|-----|
| 卓遵宏 中央银行与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 (1927—1937) .....                  | 12  |
| 陆寒寅 边缘与极化的复合均衡 :从空间经济理论分析近代上海的<br>金融中心地位 .....         | 34  |
| 赵兰亮 近代中国金融法制演进与市场变迁研究<br>——以保险法规的创制与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管为中心 ..... | 45  |
| 陈正卿 太平洋战争后日本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金融统制政策 .....                      | 60  |
| 朱荫贵 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 .....                                | 72  |
| 张忠民 略论近代上海产业证券演进中的若干问题 .....                           | 89  |
| 刘志英 近代中国的股票发行研究<br>——以上海华商证券市场为中心的考察 .....             | 104 |
| 戴建兵 近代中国黄金市场与黄金政策变迁 .....                              | 122 |
| 郑成林 近代上海票据清算制度的演进及意义 .....                             | 142 |
| 李一翔 黄 涛 民国时期华资银行业的资产负债管理 .....                         | 158 |
| 马长林 《银行周报》与近代上海金融业 .....                               | 177 |
| 何 品 权与钱的较量 :1923 年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分股事件评析 ...                 | 190 |
| 庄志龄 联合征信所 :中国第一家官办征信机构的兴衰 .....                        | 209 |
| 杜恂诚 近代上海钱业公会的准入与退出管理 .....                             | 223 |

|                          |                                                     |     |
|--------------------------|-----------------------------------------------------|-----|
| 杨天亮                      | 此情可待成追忆<br>——浅析 1917—1937 年的上海钱业公会 .....            | 247 |
| 张徐乐                      | 上海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述略 .....                                | 262 |
| 宋美云                      | 近代商会化解金融风潮之探析<br>——以天津为例 .....                      | 272 |
| <b>【专题笔谈】上海金融中心的历史变迁</b> |                                                     |     |
| 洪葭管                      | 金融中心今昔谈 .....                                       | 287 |
| 谢俊美                      |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确立原因之我见 .....                    | 289 |
| 戴鞍钢                      | 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东西部经济关系 .....                            | 291 |
| 冯筱才                      | 商界精英、地缘网络与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br>以盛竹书为例 .....              | 292 |
| 蒲小川                      | 资本市场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                        | 294 |
| <b>【档案史料】</b>            |                                                     |     |
| 吴景平编注                    | 1948 年金圆券政策的颁行 .....                                | 296 |
| <b>【口述史料】</b>            |                                                     |     |
| 尚 明                      | 建国初期的国家银行与私营金融业 .....                               | 319 |
| 王 兰                      | 建国初期对私营金融业的改造 .....                                 | 322 |
| 杨秉超                      | 我所经历的中共早期造币事业 .....                                 | 325 |
| <b>【旧文新刊】</b>            |                                                     |     |
| 汪 中                      | 上海金融中心之钱庄 .....                                     | 328 |
| <b>【书 评】</b>             |                                                     |     |
| 陶 莉                      |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金融史研究中的出色应用<br>——评杜恂诚著《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 ..... | 333 |
| 叶世昌                      | 评刘志英博士著《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 .....                         | 338 |
| <b>【学术动态】</b>            |                                                     |     |
| 张启祥 龚 辉                  | “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历史变迁”学术讨论会<br>综述 .....                    | 341 |
| <b>【资 料 架】</b>           |                                                     |     |
|                          | 中国金融史论文目录 (1993—1996) .....                         | 349 |
|                          | 近年来中国金融史方向研究生学位论文题录 (一) .....                       | 387 |

# 创刊词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在社会经济演变的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金融领域的演变有悠久的历史,金融制度的沿革变化有丰富的内容,在世界金融体系的园地中别具一格。中国金融史研究从中国金融演变的源与流出发,整合了金融和历史,它以中国历史上的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为研究对象,包括货币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与经济增长、工商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经济领域的变革和时代的发展,对金融业的研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对金融业的研究,特别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中国金融演变的状况、特色和在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作用以及两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此,我们发起成立了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并创立汇聚交流研究信息和研究成果的园地《中国金融史集刊》,为推动中国金融领域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复旦大学在中国金融史的研究方面有较悠久的历史,在学术界素有影响。早在1929年,复旦大学的教授李权时与学生赵渭人,就曾合作撰写出版了《上海之钱庄》一书,该书之完成,“十之八九靠实地调查,十之一二靠参考他书”(李权时:《上海之钱庄》凡例)。又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叶世昌教授多年从事中国金融史研究,在1963年便出版有《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86年出版了《中国货币理论史》(上册),近年来又相继出版了《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先秦至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古近代金融史》等著作,都很有影响。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人才济济,尤长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承担和完成多项研究课题。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金融史教学和研究也有较好的基础,从本科、硕士班和博士班都开设有金融史研究的课程,通过答辩、获得学位的博士论文已有十来篇,还承担了国家和教育部、上海市的社科课题,召开了关于上海金融史的国际学术会议。过去的学科划分单一,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十分清楚;教师和学生都有行政划分的限制,隶属于各自的院系,交流、合作不是没有,只是效果不显著。但随着学科建设的深入,新的研究课题不断提出,要阐释清楚相关的学理、学术概念,就要打通相关学科、整合资源。有关的研究力量之间需要加强往来,理论、现实和历史三者之间也需要经常的沟通,这样

才能赋予中国金融史研究更深厚的学术底蕴,确立在学术界的优势地位。2003年仲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经济学院和金融研究院的有关人士就成立共同的研究中心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上海是我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近百年来这个地位从未改变过,尤其是它的金融业、金融市场的发展演变,较集中地代表了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地位是中国其他任何地区无法替代的;而且上海地区留存下来大量的金融史资料文献,其研究价值之高,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公认。为了拓展中国金融史研究领域并深化研究层次,更好地为国家和上海的金融改革服务,三家单位经充分协商,决定共建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金融史学者的关心之下,经过半年的筹备,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于2004年1月正式成立,并且决定创办中心的学术刊物——《中国金融史集刊》(以下简称《集刊》)。

《集刊》暂定为每年编辑出版一辑,每辑有一主题,除围绕主题刊登学术论文外,根据金融史研究的实际进展情况,兼收主题之外的其他研究成果。本辑《集刊》为创刊号,其主题为“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之历史变迁”,所收的17篇专题论文和5篇专题笔谈,均选自2004年6月本中心主办的同名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且经过各位作者的认真修改补充。

现在固定刊登专题历史档案的学术刊物甚少,金融史专题档案的刊布情况更是不尽如人意。《集刊》设“档案史料”专栏,旨在选编刊登金融史专题档案文献,以冀对研究者有所助益。本辑专栏刊登了“1948年金圆券政策的颁行”的专题档案史料,特向有关历史档案文献机构和编者表示由衷感谢!

《集刊》设“口述史料”专栏,将陆续刊登当事人的口述或书面回忆资料,希望能够提供其他文本之外的历史资料。对于叙事完整的“始末”固然非常欢迎,但即便一时一事,只要属于亲历亲见亲闻,有史料价值,亦将予以刊登。

档案史料对于金融史研究的价值自不待言,各种旧报刊、专题文集集中的金融史文章,同样是今日的研究者不可忽略的。《集刊》设“旧文新刊”专栏,拟精选与主题相关的旧文稿,在尽可能保留文稿刊载时原貌的原则下,视情况加以必要的标点和注释。中国金融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金融界、工商界,诸如上海银行公会机关刊《银行周报》和上海钱业公会机关刊《钱业月报》这样的刊物,其地位和影响非同一般,许多文稿对今天的中国金融史研究而言弥足珍贵。本辑集刊便选登了《钱业月报》上的一篇文章。今后本栏目还将从其他金融、财政和经济类旧报刊中选载适当的文稿。

《集刊》注重研究成果的交流总结,专设“书评”、“学术动态”、“资料架”等专栏,力求全面反映金融史研究状况。

《集刊》设立编辑委员会,由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组成。另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汪敬虞先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的洪葭管先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叶世昌先生为编委会顾问。三位先生为我国金融史研究的资深学者,著述等身,均逾古稀之年而仍在金融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且热心提携后学,全力支持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的成立、运作,这次又都专为《集刊》创刊撰稿。在此,本《集刊》编委会向三位先生谨致谢忱。

除了《中国金融史集刊》之外,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还将在近期内陆续推出以研究著作、专题论集和资料集为主的《中国金融史专刊》。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对《中国金融史集刊》、《中国金融史专刊》编辑出版的支持。

《中国金融史集刊》编委会

2005 年 6 月

# 创刊贺词

复旦大学历史系、经济学院、金融研究院的各位同仁：

你们好！欣闻《中国金融史集刊》在各位的扎实筹备和辛苦努力下，即将以“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变迁”为创刊号出版发行了。作为一名多年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值此创刊号即将出版之际，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并预祝《中国金融史集刊》在你们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支持帮助下，为推动中国金融史研究的深入扩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金融体制改革，提供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取得圆满的成功。为促进金融史研究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联系，发挥最大的积极作用。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金融史研究虽已取得不少成果，但是，无庸讳言，金融史的研究相对于其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言，还远未达到名实相符的地步，可以说，研究队伍人数不够多，研究成果也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整个研究还处于比较薄弱的地位。而且，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也相对集中于部分领域，存在着很不平衡的状态。以金融市场为例，其中的拆借市场、贴现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金银市场等方面的研究，就十分薄弱，许多领域都还处于语焉不详的状况。而这些领域的研究对于当前的金融体制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而言，仅仅从提供历史借鉴的角度来看，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很大很多的。

令人高兴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这些年来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系主任吴景平教授的带领和推动下，一方面召开了几次关于中国近代金融史方面的国际会议，出版了多本论文集；另一方面指导博士生对近代中国的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外汇、私营金融业和同业团体、金融风潮等进行研究，今年一月又推动历史系与经济学院、金融研究院联合成立了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这一跨学科学术组织，为相关专业方向的学者和研究生提供了进行学术交流的平

台。现在,又以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的名义创办了《中国金融史集刊》,提供了一个研究者交流金融史研究成果、促进信息交流和学术发展的园地。在将中国金融史研究推向前进的步步过程中,可以看到主持者扎实的作风和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

我相信,依托于上海这个中国近代以来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利用以往留存下来的丰富文献和遗产,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你们一定会将中国金融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在新时代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新的要求的时候,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祝贺《中国金融史集刊》顺利创刊!

敬祝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

汪敬虞

2004 年 11 月于北京



## 试论现实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洪葭管

过去学习马克思的著作,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sup>①</sup>的时候,总要凝神想一下,觉得这句话一定含有深刻的启发人们思考的意义,但多年来一直没有进一步思考或作比较深入的研究。近几年来,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世界上各种相关事件接连发生,诸如1997年爆发影响全球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道琼斯工业股指达到巅峰后开始下落,习惯于通货膨胀的中国人忽然遇到陌生的通货紧缩,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也有一些金融机构停业倒闭清理,1836年伦敦约克郡一位银行家指出过的汇票使用中虚拟资本已经相当严重的现象却被人无限制地扩大应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金融中心经过削弱消失到21世纪初又在致力于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建设,人民币汇率问题会如此被世人重视乃至发生“人民币外有升值压力、内有通胀威胁”的复杂情况等等,使我又想起上述马克思这句话,感到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因为“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sup>②</sup>。我是搞金融史的,从这一道理推想觉得中国近代金融史上一些不易理解或难以以下正确结论的一些问题,用对于当前世界和中国金融事业高度发达然而又有隐患的新认识,是有助于对原有不易理解问题的理解,对不易下结论的问题作较接近的结论,并由此感到现实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应用的一种治学方法,一种不可替代、不应忽略而经过努力又能掌握的研究方法。

### 一、研究现实问题,有助于对历史事件的理解

这里试举几个事例。

一是对山西票号资本性质、全行业淘汰原因和总的评价问题的理解。山西票号在晚清时期曾经煊赫一时,有着辉煌的业绩,最多时共有二十多家,每

<sup>①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家在全国各地一般有十几家分号,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资力雄厚、业务发达的行业,却在辛亥革命后陆续成批倒闭,遭致全行业淘汰,其原因究竟是什么?过去学术界有过几次研讨,几番争论。这一次(2001年)又在太原召开山西票号国际学术研讨会,邀我前去参加,我虽年事已老,但仍受上述马克思一句话的启发,由于我还在担任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因工作需要平时不得不从事一些现实金融问题的研究,便写了一篇《由票号衰亡问题引起的思考》<sup>①</sup>提供给大会。文章首先指出的一个观点是:金融业是风险行业。信用机构所从事的行当是在不确定环境下对资金或货币资源进行跨期的配置,正由于是跨期的配置就容易引起脱节乃至破裂。山西票号决策者和经营管理者平时缺乏风险意识,也就不作风险防范。它在体制上和经营机制上的主要缺陷,即不实行股份制,缺乏资本积累;又不吸收小额存款,不能更多地聚集社会货币资本;贷款不求物质担保,只凭个人信用;不善于把本币和外币协调运用。没有这四条,金融机构防御风险的能力便大大减弱。票号这种货币经营资本正在力图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借贷资本,也就没有能转化成功。它过多地结交政府和官吏,曾是它不断扩展业务的条件,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消亡,就成为它衰亡的一大原因。辛亥革命爆发时,它并非资产不抵负债,而是存款必须被存户提取,而贷款却无法收回,周转不灵,只能倒闭,这便是不能抵御风险者的可悲下场。文章的另一个观点认为,票号衰亡的根本症结,是不能跟上时代步伐,不能创新,尤其是没有产生视野超出本行业、能够高瞻远瞩看到金融业发展演变前景的研究型的经营决策人才。它要避免没落,出现“中兴”局面,倡议办股份制商业银行并获得成功,时间应在盛宣怀创办通商银行之前。这并非苛求,也不是先知先觉,因为洪仁环在《资政新篇》上倡议“兴银行”,时在1859年。以票号的丰富金融实践、相当庞大的资力、遍布全国商埠的分支机构,若能联合起来成立两三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成为国人自办银行的首创者,这才是中国金融史新篇章上光辉的一页。也许是对我的优待,把我这篇企图体现“研究现实问题有助于对历史事件的理解”的文章放在会后编成的论文集的首篇,以及从会内会外学术同行的一些反应来看,我的这一尝试算是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是对上海钱庄和商界1856年确立“九八规元”为记账单位的重要意义的理解。因为研究汇率问题,我接触一些资料,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决定采用“特别提款权”为记账单位,实际使用的是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货币,这一做法与上海于1856年确立“九八规元”的做法如出一辙。上海于

<sup>①</sup> 《山西票号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1843 年开埠后,外国银行和外国商行一批一批进入上海,当时市上货物交易通用西班牙银元即俗称“本洋”为媒介。后来本洋来源渐少,打算用墨西哥铸造的鹰洋来代替,亦因鹰洋来源并不通畅而未成。在困难之中,上海商界社会于 1856 年仿照粮食业“九八豆规元”交易折扣的原理,决定采用“九八规元”为虚银两,用作记账单位,授受使用的还是实银两即二七宝银和银元<sup>①</sup>。这样,“通货”问题解决了,以后上海一切商品交易,都要按银元银两折合兑换,从而产生了以“九八规元”来计算的“洋厘”。洋厘和银拆(银两的利率)在以后一个长时期里成为上海钱庄手中运用的金融工具,每天的行市也均在钱业市场进行,并且成为以上海为中心各地与上海商品交易进行交割的“申汇”行市的由来。这种以“九八规元”为记账单位,实际使用的是银两和银元,正和 1969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采用的“特别提款权”(S. D. R.) 为记账单位,而实际使用的是美元、英镑、法郎、马克一样,只是前者比后者的产生年份早了整整一百年。当年决定采用“特别提款权”的办法,是在寻求一种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后来由于一些国家的汇率多与美元挂钩,以致这一象征国际货币合作的“世界货币”未能进一步推广应用,但它存在的意义仍应予以充分估量。

三是对 1935 年币制改革成功因素“不高估汇价”的加深理解。1935 年的币制改革是在绝对困难复杂的情况下选择正确的解决办法和坚持“不高估汇价”的原则而获得成功的。1934 年由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商店、银行、钱庄大批倒闭,经济危机严重,市场局势紧迫。当时有的人主张从平衡贸易入手,有的人主张首先要改善经济结构的职能,有的人认为扩充信用是解决之道,也有的人不认为已经造成通货紧缩因而主张仍维持兑现,只要健全银本位包括减低成色等即可。政府财政当局采纳外国顾问提出的改革方案和上海银行家提出的中肯意见,决定放弃银本位,实行管理通货和有控制的纸币政策。新的币制是汇兑本位制,新币的对外汇价不处于较高水平,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偿的货币,白银收归国有,由中央银行掌管,在国外出售后充作法币的外币储备。为稳定通货,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sup>②</sup>。这里的核心措施是对外汇价“不能处于较高水平”,潜台词便是应当贬值。币制改革后,中央银行牌价是每一元法币合英金一先令两便士半,若按世界市场的银价计算,每一元法币应是值一先令十便士半,相差八便士,也即是每一元法币的实值被压低成六角五分。正由于主动的、具备一定条件、选准时间的货币贬值,改革前那种通货紧缩、物价不正常下

<sup>①</sup> 《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6~28 页。

<sup>②</sup>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档案出版社,第 401~403 页。

跌的现象很快就告消失,物价开始回升,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因农产品价格上升也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我对这一次币制改革成功,关键因素是“不高估汇价”的理解,是从研究现实金融问题得到的。1934年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中重要措施之一,是为摆脱大萧条带来的困境,美元实行贬值,把维持了几十年的金价每盎司兑换 20.67 美元,一下子贬值为兑换 35 美元,为“新政”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条件。相反,如 1985 年日本被美国压服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度升值,使经济大受损害,乃至造成 1990 年前后的“泡沫破裂”,整整十年都没有恢复迹象,可见币值高估危害之烈。这反过来使我进一步理解 1935 年币制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是“不高估汇价”,也就是“低估的原则”的道理了。

## 二、历史研究的成果,也会对现实问题 研究者提供新材料和新认识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颇为风行的“古今中外研究法”告诉我们,研究“古”的事情要联系到“今”,研究“今”的事情也会联系到“古”,这是基本的;至于“中、外”则是说,“古”中有中、外,“今”中也有中、外。提倡这种研究方法,就是要人们从整体的角度对事物进行全面的考察,以便找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得到规律性的认识。

也举几个事例。

1997 年泰国爆发金融危机,并且很快蔓延到许多地区,当时我作了一些对中国近代金融风潮的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金融业发达的沿海城市,尤其是居于全国金融中心地位的上海,也会频频发生金融风潮,这主要是由于它们都是开放城市,货币可自由兑换,资金可自由进出,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又相当高,因而一切市场经济下所可能遇到的金融风潮它都会发生。虽然东方与西方、近代与当代会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从金融风暴的成因、爆发和后果中仍可看出许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有其普遍的基本因素,可资我们吸取经验教训。当时排列出来的旧中国十次金融风暴是:(1)因世界棉业危机而引发 1866 年金融风潮;(2)倒账严重,爆发 1883 年金融风潮;(3)高息揽存,酿成 1897 年贴票风潮;(4)受骗上当,1910 年的橡皮股票风潮;(5)政局变易,票号集中性倒闭;(6)自毁信誉,1916 年中、交停兑风潮;(7)盲目增设机构,1921 年信交风潮;(8)内外交困,1934—1935 年的白银风潮;(9)开放外汇黄金市场失败,通胀变本加厉,1947 年的黄金风潮;(10)法币、金圆券崩溃危机。把这些风潮、危机集中起来深入观察,从总结经验教训角度细心琢磨,用辩证的原理加以剖析,这就会后

迪我们对这一攸关大局的问题作认真思考,并得出几点可供现实问题研究者参考借鉴的认识,包括:(1)有信用风险,就会有金融危机;(2)1997年泰国首先爆发,迅速地蔓延到东南亚、东亚,在金融关系和贸易交往上还影响到全世界,改变了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大多在西方发生而后影响东方,第一次不再是西方影响东方而是东方也会影响西方;(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金融体制要摸索自己的发展模式,要维护自身的金融安全;(4)旧中国的多次金融风潮以及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应吸取的教训中都涉及一个问题是,不能通过货币量的任意增加、资金的过量投入来搞泡沫经济;(5)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不能没有宏观调控;(6)必须正确运用汇率政策和有效驾驭证券市场,东南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大多炒股成风,失去理性,一旦危机爆发,首当其冲的往往是证券市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东亚各国和地区的股票指数,至今均没有恢复到七年前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指数,泰国、印尼等国更是远远没有达到危机前的水平。这些都说明,历史研究的成果也可提供给现实研究者作参考和借鉴。

新近发表的《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初探(1933—1946)》,是为我们指出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关系的范例。作者在这篇论文中,把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中国工业生产力状况作了详细的阐述和深刻的分析,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极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在文章最末的总结性论述中说:“一直到上世纪的30年代中期,中国工厂工人的人均净产值只相当于一个德国工人或英国工人的 $\frac{1}{9}$ 左右;对美国工人而言,则更下降为 $\frac{1}{19}$ 。”<sup>①</sup>随后,文章联系到当前,“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卸下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当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力,仍然程度不等地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乃至第三世界中的某些国家。根据国内媒体公开的数字,1994年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1995年)的3.7%,日本(1994年)的3.5%,德国(1994年)的4.2%,韩国(1994年)的6.2%,乃至马来西亚(1995年)的21%,印尼(1996年)的38.6%”<sup>②</sup>。这真是语重心长提醒我们,尽管我国现在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增长很快,但还有薄弱的一面,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历史包袱”还没有完全卸下。读了这两段文字,一古一今相对照,凡具有爱国心的人,谁还不为之动容,要在未来的岁月中,立志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率,节约生产成本,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而加倍努力?!

<sup>①②</sup> 汪敬虞:《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初探(1933—194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6~17页。其中第17页上最后一段引文,作者注明系引自《经济参考报》2001年9月8日。

还有一个事例会让我们充满信心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200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引了英国学者提供的一组数字：在1820年（清朝嘉庆二十五年）时，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单位十亿美元）为715，其中中国为219，欧洲为188，印度为111，俄国为34，日本为22，美国为13<sup>①</sup>。中国占总额的30.6%，超过除俄国外的整个欧洲。当时中国的人口为3.8亿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1美元）为575美元，其他各国情况如下：美国为1293美元，欧洲为1123美元，俄国为751美元，日本为704美元，印度为531美元<sup>②</sup>。当时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固然比欧美国家低了许多，但与亚洲国家比，日本高不了多少，印度还在中国之下。面对古代这组数字，看了之后真是感慨万千。184年之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30%，而现在仅占4%。184年的变化，自然是巨大的，经济、政治、人口、生产、消费、政治制度、社会生产方式等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作为老大帝国，经济生产是落后了，民国时代有点起色，但好不了多少，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正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也懂得要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生产与建设，现在经济总量已为全球的第五位，进出口贸易已居第三位，有一句古话叫“方兴未艾”，前途无量，类似1820年那种辉煌，也未始不会再度出现。

最后一个事例，是“历史上上海金融中心和当前重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问题。这方面文章已发表了不少，我在《金融中心今昔谈》（本书文稿之一）短文中，把历史上上海金融中心的标志归纳为三方面，把特征归纳为八条。过去的上海金融中心深入人心，已成为当前重建金融中心的潜在有利因素，那时的一些基本情况和运作的经验教训，也就更能为研究现实金融中心者提供新资料和新认识了。

以上体会很肤浅，推理不深刻，立论也不甚允当，只是提出来求教于各位方家，希望在历史研究领域里，一些好的方法被应用，一些历史事件被理解，一些正确的结论被大众所接受。

（作者洪葭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①② 陈争平、龙登高：《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 关于《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叶世昌

196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杨端六先生编著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一书。从书名看,似乎是一部清代货币金融史的著作,其实不然。本书的内容是杨先生收集的关于清代货币金融的史料摘录,将其编辑成书。其中虽有编著者的个人观点,但主要是史料的摘编。故此书应是一部史料书,书名以称为《清代货币金融史料》更符合实际。

清代的货币金融史料很丰富,很难在约27万字的一部书中得到较充分的反映。《史稿》只是杨先生个人的读书笔记,根据其所掌握的史料,分类排比,按问题性质和时间顺序,为各类问题分别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涉及的内容并不全面,但在浩繁的历史典籍和专著中,能够整理出这样一些资料也已经很不容易。它能为后人研究清代的货币金融史提供有益的参考,告诉他们关于清代货币金融史的大致轮廓,起指路的作用。

杨先生是著名的前辈货币银行学家,对清代货币金融史的研究大概是晚年的事,因此尚来不及形成系统的观点。这对史料的准确分类和顺序安排有不利的影 响。有些原来是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被分散在不同的场合,甚至次序颠倒,看起来好像是彼此并无联系的孤立事件,未能清晰地反映历史发展面貌。譬如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先是外国银元流入,接着鸦片贸易使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引起了严重的货币危机,并削弱了清廷的财政基础,加深了社会矛盾。鸦片战争的失败,加上太平天国运动,使咸丰朝的纸币和大钱政策成为不可避免。这一历史面貌在书中是不清楚的。读者先看到了咸丰朝的大钱和纸币政策,然后又看到银贵钱贱问题,再下面才看到外国银元的流通。这样的先后次序,不便于初学者对清代货币史的正确了解。

有些史料,应该编排在同一地方的,却被分散在不同的章节里了。例如第一篇第二章(一)有“清朝重银轻钱政策”和“当时人士对重银轻钱的想法”二目。实行重银轻钱政策是有原因的,因为就总的趋势来说,银价在下落,所以清政府不得不鼓励用银,以争取维持银一两钱千文的比价。在鸦片战争前后

的银贵钱贱期间,则产生了遍于朝野的重钱轻银的政策主张。《史稿》中“清朝重银轻钱政策”的史料是乾隆朝的,而“当时人士对重银轻钱的看法”引的却是道光后期和咸丰初年的史料。两目所引史料的时间相差将近百年,不能以“当时人士”称之。这两目的史料,特别是后者,以放在第三篇第一章“银钱比价的变动”中为妥。又如第一篇第二章(二)“征收田赋时的种种剥削”、“官吏剥削引起农民反抗”二目,所引的史料有许多是属于银贵钱贱的后果。把这些史料孤立地放在前面,就看不出具体的历史内涵。类似这样孤立地叙述问题的倾向,在书中并不是个别的。

有些史料互相矛盾,需要编著者作出自己的判断,但书中往往诸说并存,莫衷一是。例如《史稿》第73~75页关于银两的成色,在引了各家的说法后,杨先生总结说:“综上所述,银两成色,依次序,可分为纯银(1000‰),足银(990‰以上),纹银(930‰以上),标准银(900‰以上)。”实际上真正的纯银是没有的,足银、纹银是一个意思(据测定成色为935.374‰),标准银可以指纹银,也可以指各地在本地区通行的统一的银两衡量标准,如上海的规元银两等。

《史稿》出版时对收集的史料似并未同原出处进行过核对,以致错字、漏字、删节不当、年份不确、出处有误等情况时有发生。以下举若干例子说明。

#### 一、《史稿》第57页:

近来铜钱之通行日见其绌。……铜矿久废……新钱可以停铸,而民间日用器皿断不能少,无处买铜,率行毁钱以改造之,每钱千质重七斤,制为铜器,加工资可易三百文一斤。

此引文出自陈度编《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银圆》,原出《时务通考》,原文为:

近来铜钱之通行日渐其绌,其故不外两端。一因铜矿久废,采办新铜甚难,新钱不能铸出,而旧钱流行天下。水火之灾,土石之蚀,销坏者岁有百十万,逐渐不敷。一因新钱可以停铸,而民间日用器皿断不能少,无处买铜,率行毁钱以改造之,每钱千质重七斤,制为铜器,加工资可易三百文一斤。

除误“渐”为“见”外,还因不适当的省略,原文中的意思不能完全表达,根本看不出论者认为铜钱日绌有两个原因。

#### 二、《史稿》第66~67页:

朕闻河南本年银价大钱一千四百有奇,地方官征收钱粮,如新郑、禹州、许州、灵宝等州县,每两竟折大钱两千二三百文,较之往年,各加二百文之多。

此引文出自《续文献通考》卷二,原文为:



朕闻河南本年银价大钱一千四百有奇，地方官征收钱粮，如新郑、禹州、许州、灵宝等州县，每两竟折大钱两千及两千二三百文，较之去年，各加二百文之多。

漏“及两千”三字，“两千及两千二三百文”和“两千二三百文”意思大有区别。“往年”为“去年”之误，今年比去年增加 200 文，不等于比以往各年都增加 200 文，故不能用“往年”。

### 三、《史稿》第 118 页：

光绪二十年，复因海防筹饷……每座捐银二百两，共捐缴银三十余万两。……查京外典当以光绪十四年座数计之，约共七千数百余座……自本年起，无论何省，每年按年纳税银五十两，岁可共征税三十余万两。

此引文出自《续文献通考》卷四七，原文为：

光绪二十年，复因海防筹饷……每座捐银二百两……共捐缴银三十余万两。……查京外典当以光绪十四年座数计之，约共七千数百余座。……拟自本年起，无论何省，每座按年纳税银五十两，岁可共征银三十余万两。

引文共有四处省略，只标了三处，缺第二个省略号。“拟自本年起”的“拟”字不能省略，因为只是户部奏议，尚未成为事实。以下“每年”、“征税”是“每座”、“征银”之误，“每年按年”含意不清。

### 四、《史稿》第 170 页：

道光年间所设立官号钱铺五处，分储户工两局卯钱，京师俸饷照公费发票之案，按数支給，以钱代银。

此引文出自吴晗《读史札记》第 82 页，原出《清史稿·文瑞传》，原文为：

咸丰三年疏言：“……拟就道光年间所设官号钱铺五处，分储户工两局卯钱，京师俸饷照公费发票之案，按数支給，以钱代银。”

原文是咸丰三年文瑞的拟议，并非事实，《史稿》将它变成了道光年间的实际政策：“分储户工两局卯钱，京师俸饷照公费发票之案，按数支給，以钱代银。”真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误“设”为“设立”只是次要的了。

### 五、《史稿》第 201 页，引文为：

汉银锡以饰器，今乃专用币，岂非以其易于积藏乎？

此引文据《鸦片战争》I，原出吴嘉宾《求自得之室文钞·钱法议》，原文为：

汉银锡以饰器，不为币，今乃专用币，岂非以其易于积藏乎？

漏“不为币”三字。

### 六、《史稿》第 216 页，引文为：